

步长制药人鲁记

本报记者 李超 菏泽报道

因为一则事涉美国斯坦福大学招生录取的丑闻，步长制药和它背后的赵步长家族，被置于公众舆论的聚光灯下。而出身于陕西的赵氏家族，其生意何以“由陕入鲁”，并最终在山东发迹，其实才是这个庞大家族财富故事的关键。

这要从步长制药的三大主营产品说起。《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这三大产品中的稳心颗粒其初始开端系收购而来，原有生产该产品的为山东地方国企，而另一主力产品丹红注射液同样有源自山东的说法。

赵步长家族至少应该是上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受益者，其时当地

收购国企

1997年10月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后，原菏泽制药厂以84万元卖给一家民营企业康得斯生物化工技术有限公司。

“因看中一个药号——国家级中药‘稳心颗粒’，赵步长决定接盘濒临破产的原菏泽制药厂。”在相关材料的记载中，这似乎是赵步长家族“入鲁”的一个起点。

相关资料显示，原菏泽制药厂1994年投产的“稳心颗粒”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效果显著，而陕西步长的著名产品“步长脑心通”及其系列药物，治疗脑血管疾病非常有效，但在治疗心血管疾病方面不甚理想。陕西步长也发现，“稳心颗粒”与“步长脑心通”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黄金搭档。于是，尽管陕西与山东有“千里之遥”，收购还是发生了。

2001年，陕西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步长只是看中了国内唯一的稳心中药药号——国家级中药“稳心颗粒”，因此接盘了原菏泽制药厂，组建山东步长恩奇制药有限公司（步长制药的前身），当年便实现利税4000万元。

另据大众网报道，步长制药经营不到一年，平均每月的销量就超过前些年的全年销售总量。

而在此之前的1997年下半年，原菏泽制药厂负债高达130%的国营企业停产了。

1997年10月经过严格的资产评估后，原菏泽制药厂以84万元卖给一家民营企业康得斯生物化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得斯”），并更名为山东恩奇制药有限公司。康得斯入主后先期注入资金600万

官员甚至有“八抬大轿抬来赵步长”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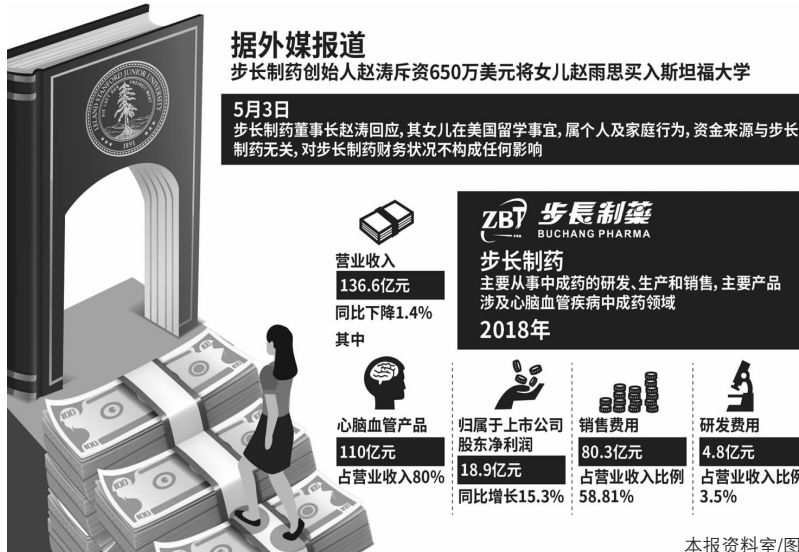
2004年步长制药收购山东鲁鹰药业有限公司时，花费1000万元人民币，有信息显示该厂生产丹红注射液。而在11年后，丹红注射液将给步长制药带来超过40亿元人民币的单品年销售收入。年销售额近20亿元的稳心颗粒（累计过百亿元），亦是通过类似的收购路径而来。只不过，赵步长家族当年收购生产稳心颗粒的原菏泽制药厂，价格却始终是个谜团。针对相关事宜，记者多次致电或短信步长制药高管均未获回复。步长制药官网则称，赵步长研制成名牌产品“丹红注射液”“步长稳心颗粒”等著名心脑血管

血管病药物。

经由这些收购，赵步长家族和步长制药在山东完成了崛起的过程，而其社会地位也迎来显著变化。从2008年开始，赵步长与其子赵超同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赵步长在连任两届后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而赵超则连续三届至今仍任全国人大代表。所不同的是，赵步长在山东当选，而赵超在陕西当选。

除此之外，2018年步长制药两位管理人员赵菁和薛人晖同时当选山东省政协委员，同在医药卫生界。赵菁是赵步长的女儿。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显赫的家族。



元，不但半个月企业便起死回生，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里康得斯解决了400多名员工的生活问题。据当地政府统计，截至1999年康得斯向地方政府缴纳税金227万元。

“手握‘稳心颗粒’的原菏泽制药厂只是在管理和销售上存在问题，康得斯介入后使得药厂很快起死回生，足以说明‘稳心颗粒’是一颗金蛋，谁得到谁就是赢家。”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坦言。

此后，因为康得斯母公司投资出现问题，资金链紧张，便引进山东鲁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投资”），企业再次更名为山东鲁银恩奇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银恩奇”），但因鲁银投资1998年度配股计划流产，鲁银恩奇缺乏扩大再

生产的资金，加上在管理和销售上面的错误决策，到2001年鲁银恩奇难以继，再次破产拍卖，接下来陕西步长接手了鲁银恩奇（即原菏泽制药厂）。

然而对于这段历史，步长官网及步长制药招股说明书并未作出明确表述。因此对于当时陕西步长接盘原菏泽制药厂包括价格在内的具体收购事项成为一个谜。

尽管如此，2002年因将“稳心颗粒”推向市场等原因，步长制药营收大幅增加至超过10亿元。

《中国经营报》记者致电采访当时参与收购的知情人士遭婉拒。

记者还多次致电和短信步长制药董秘蒲晓平和副董事长赵菁了解该笔收购详情，也未能获得回复。

发迹山东

如今步长制药的三大主营产品中的丹红注射液和稳心颗粒均源于山东。

该收购完成后，步长制药陆续兼并和新建企业，先后有步长集团四个关联的法人单位落户菏泽，开始了在山东的快速发展。

步长制药高管刘鲁湘曾公开表示，而后步长制药又收购了山东省内一家生产丹红注射液的国营药厂。记者查询发现，该收购或为2004年步长制药的两个关联企业收购原济南军区空军下属的济南鲁鹰药业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的交易。

此外，另有两篇医学论文明确标注，丹红注射液为济南鲁鹰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招股说明书显示，2004年4月步长制药通过两个关联企业耗资1000万元收购了山东鲁鹰药业有限公司，2004年7月更名为济南步长制药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丹红制药有限公司；而收购以稳心颗粒为核心的原菏泽制药厂则显得比较神秘，在招股说明书中只字未提，而且公开信息中也未查到该笔收购的具体价格。

但从中不难看出，如今步长制药的三大主营产品中的丹红注射液和稳心颗粒均源于山东。收购稳心颗粒后，步长制药先后

四位“代表委员”

父子二人同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步长制药早已桂冠满身，赵步长家族的身家曾一度超越山东魏桥集团张士平家族成为山东首富；而在2016年11月18日步长制药首次发行6980万股上市交易，使得步长集团（赵氏家族）成为陕西首富，在上市交易的第一天即拥有财富548亿元。上市一周后，市值飙升至883.61亿元。

财报显示，2018年步长制药实现营业收入136.64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88亿元。

如今，步长制药早已实现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纳税连续多年蝉联山东省纳税企业百强，并成为菏泽第一家A股上市主板挂牌企业。

而伴随着步长制药的发展壮大，赵步长家族成员的财富不断增加，赵步长家族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标志之一，

在菏泽建立其稳心颗粒和丹红注射液两大产品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并不断改进。

针对丹红注射液的起源等问题，记者多次致电或短信给赵菁和蒲晓平，截至发稿二人均未回应。

公开资料显示，步长制药以脑心同治论为理论基础，研发、培育出了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三个独家专利品种，后来又研制出谷红注射液，与之前的三个专利产品对步长制药的业绩贡献较大。上述四项产品中，任一产品的生产、销售如出现较大变化，都有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在营销领域，步长制药不惜花费重金加大广告攻势，并借鉴国际药企举办学术论坛等学术推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业绩增长。以2013年至2015年为例，步长制药三年学术推广费用累计达154.9亿元。三年间平均每月推广费用为4.3亿元。

2018年上述四项产品合计收入达91.43亿元，2017年该四项产品总收入为99.44亿元。而此前的2013至2015年脑心通胶囊、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三种产品

销售总额分别为67.52亿元、

便是慈善、捐赠以及相关公益领域，赵氏家族成员及其企业成为慈善领域的高光人物。初步统计，数年间赵步长家族累计捐款数亿元。得益于其投身公益事业，赵步长家族有4人先后进入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理事等社会团体。这其中包括：

赵步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2005年至2010年）；
赵涛，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2010年至2015年）、山东省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赵超，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2015年至今）；
赵菁，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2015年至今）、山东省工商联副主席（2017年至今）。

几乎与之同步，赵步长家族

78.63亿元和88.17亿元，三种产品合计收入占比70%以上。其中稳心颗粒2013年至2015年的销售额分别为13.63亿元、15.10亿元和17.94亿元，约占各年总营收的15%左右；而丹红注射液的销售额分别高达33.59亿元、38.31亿元和41.60亿元。

米内网（医药健康信息平台）数据显示，脑心通胶囊、丹红注射液、稳心颗粒三个独家专利品种2017年在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份额的排名在前20位。而根据《心脑血管中成药市场研究报告（2016年度）》的数据显示，步长制药在心脑血管中成药领域2016年的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值得注意的是，步长制药官网宣称，赵步长研制成名牌产品“丹红注射液”“步长稳心颗粒”等著名心脑血管病药物。

如今菏泽已是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部所在地，步长制药极力主推菏泽步长医药产业园的持续投资扩建，打造200亿元产值规模医药园区。

2001年东入鲁时，步长集团年产值7.98亿元，到现在年销售额过百亿元。赵菁曾言：“山东的投资环境非常好，步长腾飞于山东。”

成员也逐步开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2008年开始赵步长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代表团）；

2008年至今赵超（赵步长儿子）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陕西代表团）；

父子二人同为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此外，2018年步长制药两位管理人员赵菁（赵步长女儿）和薛人晖同时当选山东省政协委员，同在医疗卫生界。

“一家民营企业集团同时有两位政协委员或两位人大代表，尽管赵步长父子的代表资格分别属于由不同省份选举产生的，”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协人士直言，“但这也充分说明陕西和山东两地对步长制药的重视程度以及步长与政府关系的融洽。”

定向降准释放资金2800亿 有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就在5月6日，央行发布公告称，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9年5月15日开始，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根据公告，约有1000家县域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释放长期资金约2800亿元，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记者注意到，在定向降准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发力下，今年一季度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成本出现明显下降，但是进入4月份，信贷获取难度降低，融资成本却出现上升，大多数民企以中小企业为主。日前渣打银行发给记者的4月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调查结果就显示，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成本经历2月期待已久的下降和3月持稳后，4月再次出现上升。4月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成本指数由3月的50降至46.5(50以下表明利率上升)。SMEI是渣打基于对全国范围内逾500家中小企业的月度调查问卷结果统计后得出。

就此，渣打银行中国区经济师申岚5月8日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称：“4月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之所以出现上升，主要源于市场利率有所走高，国内货币政策略有边际的转向；同时，银行风险偏好低，因为债券市场出现一些违约事件，导致二季度的市场风险溢价上升。不过，鉴于政府愈加关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预计2019年余下时间内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仍具备改善空间。”

融资环境仍有改善空间

之所以具备改善空间，在申岚看来，这是受到政策的支持。

4月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会议还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小微企业融资规模增加，成本下降，促进就业扩大和新动能成长。其中，工农中建交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带头，确保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长30%以上，小微企业信贷综合融资成本在去年基础上再降低1个百分点。

根据央行发布的公告，此次仅对在本县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该

解决融资难题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

中小微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直备受市场的关注。就此解决措施，潘向东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主要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其中间接融资占比高。由于中小微和民营企业缺乏足额的抵押品，企业运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较难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因此，我国需要针对不同的中小微和民营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解决其融资难题。”

档口目前为8%。对此，央行解释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促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对于此举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效果，新时代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说：“央行此刻实施定向降准，尤其是只针对中小微企业和民企，这样既防止了大水漫灌，又可以实现精准投放到对就业和经济主体贡献比较大的经济主体——中小微企业和民企。”

据潘向东具体分析，该措施一方面有助于构建“三档两优”的存款准备金调控框架，体现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优势，从政策层面有助于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另一方面县域农商行对中小

微企业和民企投入力度比较大，定向降准有助于降低县域农商行负债端成本，进而降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从流动性角度，也有助于缓解二季度较大的流动性缺口，更精准地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一般来说，服务县域的金融机构具有普惠性质。目前我国的农村商业银行绝大多数是服务县域的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扎根基层、服务普惠金融。

央行有关负责人也表示，此次调整聚焦仅在本县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对其实行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这将明显增强服务县域中小银行的资金实力，促进其降低融资成本，更好

她进一步分析说，在间接融资领域，银行信贷的资金成本小于民间信贷、信托产品、P2P、高利贷等渠道。但如果按照1000万元贷款作为小微企业的界定，在7000万元的中小企业中，能够达到1000万元贷款规模的占比不到10%，仍有大部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达不到银行的信贷要求，需要转向民间信贷、P2P等渠道，以更高的成本获得融资。

对于解决措施，刘哲向记者

地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指出：“这次主要是针对中小银行的结构性价降，旨在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有利于引导资金更多的流向这些企业。”

因而，刘哲认为，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还需要进一步发挥中小银行决策机制的灵活性、审批的效率，以及对于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征信情况等更为熟悉的区域优势，创新出更多差异化的、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

记者采访获悉，未来定向降准仍有空间。“当前民营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得到了阶段性缓解，但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任务依然艰巨，预计还会有更多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

表示，要解决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首先要改善金融供给结构，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

在刘哲看来，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和与之匹配的服务对象，金融服务经济要把脉，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让合适的金融机构去服务适合的实体经济，建立多层次的金融体制，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

提供支持，仍有降准空间。”刘哲对记者表示。

潘向东也告诉记者：“预计未来依然存在定向降准的可能。因为一方面有助于克服总量和结构的关系，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我国2019年后流动性缺口依然较大，通过创新金融工具既可以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

二季度货币缺口就比较大。根据中泰证券的统计，二季度共有11855亿元MLF到期，其中4月17日3665亿元，5月14日1560亿元，6月6日4630亿元，6月19日2000亿元，依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由此该券商认为，用降准的方式对冲基础货币缺口可能仍是央行的最优选择。

其次，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刘哲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都正处于摸索完善的阶段，如何应对金融体系完善过程中的“一刀切”的方式对于金融风险控制来讲非常直接，但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创新完善来讲，会降低金融的资产配置功能。应对金融领域的信息不足和信用不足的问题，需要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